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共同富裕： 内涵、价值与路径

王鑫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 200020)

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是集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以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初心使命的思想资源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的起点是消除贫困,经过百年探索,形成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和内涵,构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现代分配体系,超越了西方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分配方式。共同富裕是动态的概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基于自身实践的现代化概念和理论框架。这一中国式现代化分配体系是以党的领导为力量保障、“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保障、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保障组成,开辟了一条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

关键词: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现代分配体系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22)03-0024-10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22.03.003

一、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结合的实践史,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史。本文所讲的中国式现代化也是此意义上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这条道路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其核心命题在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作为奋斗目标。^①

中国式现代化重新定义了现代化(性)的概念和含义。近年来,现代化道路是一元化还是多线论之争愈演愈烈^[2],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尤为明显,甚至可以形容为它们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

收稿日期:2021-11-13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路径研究”(2021BKS003)

作者简介:王鑫,男,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月刊》杂志社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研究。

①《中国共产党章程》的首段就鲜明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立之中。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通过“文明”话语的输出,实现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殖民,以不断强化自身文明的优越性。正如马丁·雅克所说:“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从根本上说将不再是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不平等的竞争,而是逐渐演变为不同现代性之间的公平竞争。”^[3]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很多国家对本土文化持抛弃或怀疑态度,如新加坡和韩国。中国在19世纪末亦是如此,不乏进步人士认为西方的思想和技术代表未来,不仅要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且要接受西方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面临着殖民主义危机,救亡图存是中华民族的最根本任务,这是中国现代性的起点^[4]。因而,中国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国家而非个体,中西方现代性的起点不同,决定了中西方现代化的方向和过程也会不尽一致。因此,用西方的概念很难理解中国的现实,西方的概念传入中国需要结合中国的实践重新阐释,只有结合中国自身的文化和现实,才能够产生替代性的概念、理论和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

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现代化走向提供了新的参照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的追求目标,遵循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原则,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以资本为逻辑的现代化的差异,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多样化的样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5]在现代化进程中构建中国现代性,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时代课题。

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的需求出发,提出未来社会要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消灭人压迫人的剥削制度,实现人与人的平等关系。未来社会是所有人都富裕的社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6]。经典作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很多关于未来社会的论述,他们认为未来社会的物质生活是优渥的、美好的,是不需要忧虑物质生活需要的社会。恩格斯认为:“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7]列宁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8]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关于人类共同富裕的理论”^[9]。

(一) 共同富裕的概念缘起

“共同富裕”是毛泽东基于中国文化和人民诉求提出的分配方式。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第一次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10]。据考证,“共同富裕”一词在1953年之前从未出现在党的文献中,但在1953年,仅在《人民日报》中就出现了12次^[11]。毛泽东第一次谈到共同富裕主要是针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享受社会主义的成果,“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2]。经邓小平的理论总结,将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以及社会主义在民生层面的终极目标,并在中央的重要文本中予以明确,还通过入宪的形式确定起来。自此,共同富裕成为社会主义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共同富裕汲取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思想。如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具有一定的平均分配的意义,其制度设计也有利于政府对土地的管理和征税。此外,还有“限田制”“均田制”等制度,均体现了中国古代统治者“均地安民”的施政纲领^[13],也说明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充分考虑了分配的问题。在思想史上,《礼记》对农耕中国的社会群体给予了明确定位,“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14]。儒家的理想社会营造了社会安定的氛围,老有所养,幼有所依,各司其职,不仅强调了人民的生存权,而且这样的理想社会也需要有相应的政治制度才能运行,即“选贤与能”,而选取合适的人来治理国家是这一套大同社会的前提和保障。其实,孟子对“均地安民”的设想更加贴近现实,他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即只有让人民拥有赖以生存的土地,不至于饿死,社会才会安定,同时要平衡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利益。“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①所以说,共同富裕的概念与中国儒家的“大同社会”具有一定的相通性,与其他分配概念相比,更能让中国社会所接受。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共同富裕有两层意思:一是生产力极大发展;二是按照人的需要对资源进行分配。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平等的物质基础是生活资料的平等。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这一套制度能够解放生产力,实现物质的极大繁荣,更重要的是其内在蕴含共同富裕的思想,体现了制度的人本性质。纵览党的百年历程,对共同富裕的理解也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过高地估计了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条件,强调一味的平等,忽视了生产力水平,导致制度偏向于“平均”的分配方式,其结果变成了贫穷的分配,从而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出现了认同危机,如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里揭露了20世纪70年代,“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从陆路或水路逃亡香港”^[15]。针对“逃港”问题,邓小平认为其主要问题是两地的生活水平差距较大,只有提高大陆的生活水平,类似问题才能解决。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多次强调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6]邓小平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最终要落脚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上来。

(二) 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产生两极分化,进而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马克思分析了劳动、商品的两重性,阐释了剩余价值理论,从而得出了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实现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资本与生俱来具有趋利性,导致资本家以牺牲工人健康和生命为代价,尽可能多地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7]。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工人生活质量取得了很大的改善,劳资关系也不像以前那么剑拔弩张。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不平等的生产关系很难说能够得到实质性的改变。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分析了欧美国家300多年来的经济数据,得出了资本收益率大于国民经济增长率的结论(除了战争时期)。也就是说,在历史长时段中,财富的获得不仅由劳动决定,更多的是由继承的财富决定,贫富差距始终在拉大^[18]。

随着技术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资本主义国家掠夺剩余价值有了新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体系推行了更加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生产体系。金融资本的兴起以及本国劳动者成本的提升,促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大量工业等实体经济向经济落后国家转移,以利用其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而这些转移的工业大多是低端产业和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主义国家仍掌握着核心技术,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技术封锁。资本主义国家低价进口所需要的日用品等消费品,高价出口具有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和奢侈品,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掠夺。西方现代化中的“剥削”本性始终未变。

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是美国剥削其他国家的新形式。“华盛顿共识”之后,美元取代黄金

^①参见《孟子注疏·滕文公上》卷5(上),赵岐注。

成为唯一的国际流通货币。美国通过掌握国际货币的发行权,实现对他国的经济控制。但金融部门不具有生产服务的职能,只追求自身的增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得美元取代黄金成为世界贸易的计量货币,物品的真实价值与黄金脱钩。美国一旦出现经济危机,通过增发货币,致使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就可以让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承担其经济危机带来的损失。并且,让商品失去固定的衡量价值,导致贸易的失序,最终为其买单的仍是劳动者。金融资本的发展,导致了金融与实体的脱离,目前整个世界金融资本发展的态势是虚拟资本逐渐扩大,实体经济逐渐缩小,虚拟经济无法在现实世界里得到依托,其必然走向崩溃。由此,以失去实业为支撑的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危机重重,其政府权力亦会被资本攫取,政府机构成为资本的代言人,也必然导致“全球金融垄断资产阶级与世界范围内劳动者的对立,金融资本集体之间及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与矛盾”^[19]。

(三) 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标志

共同富裕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16]123}“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16]216}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的最终落脚点归结于共同富裕,这是同资本主义社会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颠倒过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交换价值,导致了人的异化,人失去了作为人的生存和自由的权利。可以说,西方是被资本所主导的现代化,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话语霸权等政治话语充满了对人本逻辑的背离,并通过法律的形式将这一套逻辑作为社会的普遍行为准则,并凌驾于其他逻辑之上。而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在此阶段,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通过共同富裕打破“物的依赖关系”的枷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高价值旨趣。现实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落后生产力的现实状态下建立的,需要利用资本主义的优秀文明成果来发展生产力。但在这个过程中,要始终践行共同富裕理念,失去了共同富裕的目标,也就谈不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路。改革开放以来,对共同富裕的理解形成了一系列的新认识。邓小平首先对共同富裕问题作了全面的阐释,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将共产主义理想与时代背景相结合,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将共同富裕与“两极分化”对立,其实质是社会主义更加注重公平原则。中国社会主义在引入市场经济以来,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明确了共同富裕的主体是人民。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将人民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了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2018年,现行《宪法》经历了新一轮的修改,五大发展理念被写入《宪法》序言部分,指导制度和政策的实施,其中“共享”发展涉及的就是分配议题。从全面建设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有人脱贫,所有贫困县实现“摘帽”,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战略目标,都是对共同富裕目标的有力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结果上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发展成果全体人民共享的模式。无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了西方国家“弱肉强食”的现代化道路。

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理解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一种动态的概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

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的首要问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导致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因此,如何在经济发展和公平分配之间取得良性平衡,是一项重要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报告也提出了新时代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新的历史征程中,要充分认识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的内涵,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 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的起点是消灭贫困。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正式确认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并宣布中国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20]。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21]449},社会主义制度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21]459}。概言之,在早期的革命家眼里,社会主义是消灭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实质是将生产资料从地主、资产阶级手里收为国家所有,发挥公有制的制度优势,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贫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江泽民认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22];胡锦涛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23]。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共同富裕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论断、新理念和新要求:在战略地位上,再次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本质要求;在发展的标准上,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发展特征和目标上,“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24],并且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力量保障上,“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25]。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科学指南和理论依据,为探索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方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九大愿景目标,其中,关于分配的目标是“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①共同富裕贯穿在党的百年探索历程中,并且也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愿景目标。

(二) 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

共同富裕不是均等富裕。经过7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特殊时期实行的“一大二公三纯”的制度,主张多干少干一个样,导致劳动者失去劳动积极性。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起点,与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分配方式能够提高劳动积极性,进而提高经济效率,同时也能够促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即使未来生产力取得了极大的发展,所有人都凭劳动和贡献获得收入,整个社会实现了富裕,但每个人的资源禀赋不一样,勤劳和懒惰的工作特点也应在收入分配上有所区别。

共同富裕是物质精神的双重富裕。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等级,物质需要仅仅是最基本的需求。马克思、恩格斯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也就是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未来社会的共同富裕不仅包括物质方面,精神层面的富裕更为重要。物质富裕的目标指的是要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载《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第1版。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26]^[28]。中国的橄榄型结构与美国的橄榄型结构有很大的区别。美国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收入分布,1%富有的家庭拥有的资产额占有全部资产额的62.4%^[27]。虽然美国人民生活水平比大多数国家都高,但其社会两极分化的态势越来越严重,“美国上层1%的人现在每年拿走将近四分之一的国民收入,以财富而不是收入来看,这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财富……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28]。中国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是财富存在差别但是差别不大的分配格局。中国现今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尽可能减少贫困人口,扩大中等收入人口,保持在平均线周围,有所差别但差别不大。而精神富裕指的是“反映和衡量主体(个人、政党、民族、群体、社会等)基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之上,在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领域中,在各种精神要素资源(思想道德、文化艺术、教育科技、知识水平、意识观念、价值取向、理想信念、风俗习惯、思维和行为方式等)选择、追求、创造的能力及意愿,以及在此过程中展现出的正面而积极的精神满足、享受、发展和超越程度的哲学范畴”^[29]。也就是说,精神富裕指的是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正确的价值观念、活跃的思维方式和多元的精神生活。而在当代中国的环境下,精神富裕更多的是需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劳动光荣的财富观等。

共同富裕的衡量标准随着生产力发展逐渐动态向上。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次以“中等收入陷阱”来形容一些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未能持续提高甚至出现倒退的现象。一些国家,在人均收入上,无法超过1万美元;在劳动力市场上,无法同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竞争;在尖端科技上,无法同发达国家竞争,国家经济陷入停滞状态。中国追求的共同富裕不是中等收入水平的共同富裕,而是高质量、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中国2020年的国民人均收入总值超过1万美元,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在2023年可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30]。因此,共同富裕不是一个固定概念,而是一个相对概念,是由低到高逐渐推进的过程^[31],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富裕的标准也会相应提高,所以共同富裕也应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共同富裕没有一个具体的衡量尺度,但是共同富裕有一个具象化的要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主要包括教育、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居住条件、居住环境等方面。共同富裕在理论层面意味着公平与正义,在实践层面,是依据生产力水平而判断。总体而言,共同富裕的实质就是要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加平等的生存权,在医疗、教育、出行、环境等方面享受更加平等的待遇。过去中国共同富裕的目标是要发展生产力,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生产力已基本达到最初的设想,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使底层的人也富裕起来。因此,当前中国最主要的任务是优化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中处理好劳动和资本的分配比例,在二次分配上拓展多种渠道,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分配调节力度,促使社会更加公平,健全三次分配体制机制,建立财富由高向低的动态流动机制。

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的初心和使命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美好生活”有国家和社会两大目标。国家层面的目标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①“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层面的目标是,不断改善教育、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居住条件等这些关乎民生的领域,让“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简言之,就是对法治、公平、正义、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改革开放初期,解决的是温饱问题,追求量的增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追求质的发展。“美好生活”则是对“质”的追求。从表观上来讲,仍然是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改革开放40多

^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要求,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民生、国防和人民生活等九个方面。

年来,中国最伟大的成就是实现了全体人民的小康,主要矛盾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深层原因仍旧是中国的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当前,应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总结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的经验。

(一) 党的领导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力量保障

在理论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在实践上,需要根据国情世情的具体情况,根据现实条件调整发展方向,既注重市场的激励机制,也需要重视市场自发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有赖于执政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运用市场规律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适时纠偏。能不能走上一条共同富裕之路关涉到人民是否幸福、道路是否正确、共产主义目标能否实现。

共同富裕需要“有形之手”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党的领导在迈向共同富裕目标中的作用至关重要,通过“看得见的手”保障共同富裕,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市场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式,现阶段既需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又不能放任市场。没有强有力的政府限制市场的自发发展必然走向失序。邓小平对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时表示:“一部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16]23}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普遍贫穷,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邓小平通过“先富带动后富”的方式鼓励劳动人民积极创造财富,提高劳动积极性。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1.13万亿美元,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已经实现了生产力的发展目标。但是先富并没有带动后富,因为先富的人纷纷出国。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第一部年度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显示:在2017年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企业家中,超过71%的企业家已经移民或者正在考虑移民,有27%的企业家已移民,近3年至少有170亿元资金流向国外。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东部沿海城市在资金吸引、人才支持等方面明显超过中西部城市,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其他地区。事实证明,实现共同富裕途径不能仅仅依靠“先富”带动“后富”,还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进行调控,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地区面临的情况不同,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和条件也不尽相同,不同地区应当制定符合地方经济水平的政策^[32]。

(二)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中妥善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强调,“努力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中国的共同富裕问题需要根据特定历史时空平衡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上一直有很多种声音:有的认为,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生产决定分配与消费,先生产,后消费,因此中国目前的重心应该放在生产,即“做大蛋糕”上^[33];有的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大,冲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应该注重公平分配即“分好蛋糕”上^[34];有的认为,市场经济按生产要素决定的收入分配格局,收入差距扩大是必然结果;也有的认为,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是必然趋势,发展到一定阶段,差距就自动缩小^[35]。以上观点都没有认识到今天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对此给予了明确的回答:“社会上有一些人说,目前贫富差距是主要矛盾,因此‘分好蛋糕比做好蛋糕更重要’,主张分配优先于发展。这种说法不符合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36]12}改革开放后,为了发展经济,形成了以效率优先的分配格局,并以立法的形式将资本等生产因素纳入到分配要素中来,这一套分配方式有力刺激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生产力,但也带来了分配不均的问题。“贫富差距”问题频频出现在21世纪以来的新闻媒体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的政策在保障效率的同时,也注重公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点谈到

社会分配问题,并将扶贫工作视为新时代的重点工程。“检验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37]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不能简单地理解成过去的平均主义,共同富裕意味着机会公平,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共同富裕作为以后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其“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26]25}。

(三)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基本经济制度保障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发生变化,决定了中国依旧将发展生产力作为主要任务。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强调效率优先,经过“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都是好猫”的粗放型发展,发展到“坚持用新发展理念统领发展全局,坚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36]13},实现了高速到高质的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前提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产生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只有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实现公平分配的构想,从而实现最高等级的分配正义。同时,公有制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毛泽东曾公开提出,只要保证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变,政权的社会主义属性便不会改变^[3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在国民财富中占据实质性比重的公共财富为实现社会应得理论意义上的分配正义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财力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更接近分配正义的目标”^[39]。公有制是实现分配正义的制度保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四) 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解决问题的中心仍是发展生产力。不平衡问题,主要指的是当下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发展不平衡等,这些因素制约着中国进一步往前发展。不充分发展,指的是我国与发达国家尚有不近的距离,资源利用效率不充分,创新发展能力挖掘不充分。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归根结底属于生产力不发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为上下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二个层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贫困问题,满足人民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40]。从生产力角度来看,实现社会阶段的质变,仍是任重道远的历史重担。即使到了今天,中国虽然在GDP总量上达到了世界第二的水平,但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美国的七分之一,排在世界八十位左右”^[41],中国过去40多年的发展,在总量上取得了成就,但是在质量上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扶贫成就显著,但贫困人口的数量和贫困地区的生活质量仍需关注。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42]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成能且只能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任何束缚和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言行,都是违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都要坚决反对,排除各种干扰。”^{[36]10}

五、结 语

从土地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历经百年探索,让“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建立起本质联系”^[43],即没有建立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没有打破几千年来生产资

料私有制,是不可能现代中国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与中国共产党密不可分。毋庸置疑,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了新的文明类型,它以共同富裕作为起点和归宿,以人民作为力量和主体,这也是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彰显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且在实现方式上,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通过市场经济实现资源有效配置,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不忘初心”,造就了世界历史上的经济奇迹,成为21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诸如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将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包括在20世纪苏联解体后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的终结”的福山也开始修正自己的结论,“历史的终结推迟了,我们在实际上走错了方向”,并认为“中国模式”构成了对“历史终结论”最大的挑战。同时,中国“共同富裕”的经验和话语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家最为接受和认同的,其成果也备受世界瞩目,应当将共同富裕理论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勾连起来,在同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中取得共识,成为中国理论向外传播的名片。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N]. 人民日报,2021-8-18(1).
- [2] 王海滨. 现代性反思视角下的中国道路[J]. 文史哲,2020(3):20-25.
- [3] 马丁·雅克. 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M]. 孙豫宁,张莉,刘曲,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115.
- [4] 张明. 中国现代性的复调式语境与原初特征[J]. 学术研究,2019(11):32-38.
- [5]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1-7-2(2).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22.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14.
- [8] 列宁. 列宁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6.
- [9] 邱海平. 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与实现途径[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4):21-26.
- [10] 张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97.
- [11] 孙业礼. 共同富裕:六十年来几代领导人的探索和追寻[M]. 党的文献,2010(1):80-87.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661-662.
- [13] 刘煜端. 古代文献所见国家土地管理理念的历史回溯——以“均地安民”为主要线索[D].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2012.
- [14] 戴圣. 礼记·礼运篇[M]. 刘小沙,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7:658-659.
- [15] 傅高义. 邓小平时代[M]. 冯克利,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387.
- [16]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97.
- [18] 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387-442.
- [19] 栾文莲. 当今国际金融危机是当代帝国主义经济体系性、总体性危机[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1):49-53.
- [20]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18.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1953.01—1956.09):第2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22]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40.
- [23] 胡锦涛. 胡锦涛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24.
- [24] 习近平.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确保“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开好局起好步[N]. 人民日报,2021-1-30(1).
- [25] 习近平.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1-2-26(2).
- [26] 习近平.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27] 程恩富,刘伟.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论解读与实践剖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8):41-47.
- [28]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1%的民有、民享、民治[N]. 环球时报,2011-10-18(15).
- [29] 汪青松. 内涵·价值·构建:精神富裕三维之解[J]. 学术论坛,2011(11):55-59.

- [30]林毅夫.我国具备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EB/OL](2018-01-14)[2022-03-06].<https://m.gmw.cn/baijia/2018-01/14/27344729.html#verision=b92173f0>.
- [31]卫兴华.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J].经济纵横,2013(1):1-7.
- [32]郭丹丹,苏昕.共同富裕目标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1(5):93-106.
- [33]蔡昉.通过改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1-8.
- [34]苏伟,王骏,陈剑,等.论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几个理论问题[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12):42-48.
- [35]靳涛,邵红伟.最优收入分配制度探析——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倒“U”形影响的启示[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5):44-64.
-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37]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J].求是,2013(1):3-7.
- [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413.
- [39]张国清.分配正义与社会应得[J].中国社会科学,2015(5):21-39.
- [40]胡鞍钢,程文银,鄢一龙.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1):5-16.
- [41]习近平.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EB/OL](2015-09-22)[2022-03-06].<https://news.12371.cn/2015/09/23/ARTI1442999601014717.shtml>.
- [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245-246.
- [43]吴晓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J].哲学研究,2019(7):3-10.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Connotation, Value and Path

WANG Xin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Shanghai 200020, China)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socialism and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is a combination of Marxist theor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al ideal of “the unity of the world” and the ideological resourc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rough struggles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CPC to explore modernization is to eliminate poverty. The CPC has developed a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modern distribution system with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after a century of exploration. Common prosperity is a dynamic concept, which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developed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has formed a modernity concept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its own practice in this process, which transcends the Western distribution system centered on “capital logic”. With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s the guarantee of power, “people-centered” as the guarantee of value, and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mainstay of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Chinese modern distribution system has opened up a modernization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glob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Marxism; modernization; modern distribution system



(责任编辑 张伟)